

从“范雨素网红事件”看底层写作的突围与困境

游翠萍

新世纪以来, 底层文学、底层写作成为继九十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以来最大的热点, 而且顺理成章形成了一种对“底层写底层”的期待视野。这种期待首先来自于对当代文学关于底层和苦难书写的不满。很多学者都表达过对作家“代言底层”的不满, 认为这样的“代言”往往导致对底层的遮蔽和污名化。有学者认为, 当代很多描写底层的代表性作家“在叙写底层生存的苦难时, 都呈现出异常尖锐的审美质感, 甚至是带有某种宿命的意味……所有的弱势者始终处于被伤害与被侮辱的地位, 他们的尊严被不断践踏, 他们的反抗充满绝望, 他们的不幸永无止境, 很多人物最后只能以惨烈的死亡来了却尘世的悲苦”, “作家们普遍地陷入了某种迷惘性的同情误区, 缺乏必要的叙事节制和独特有效的理性思考。”^① 底层能否代言底层, 学界有相当不同甚至对立的看法。不过, 观点虽有分歧, 并不妨碍近些年一波又一波的底层写底层的“底层文学”通过主流文学奖、网络、新媒体传播等方式被发掘出来, 他们呈现出与主流底层文学不一样的底层经验, 似乎印证了底层写作的可行性, 缓解了文学对于“底层”的焦虑。

最近借助新媒体的传播, 非虚构文本《我是范雨素》一夜爆红, 成为继郑小琼、余秀华之后又一涉及底层写作的热点事件。范雨素文章浓缩了三十多年中国社会的众多热点问题, 也再一次将底层写作放到了舆论的前台。“范雨素网红事件”不是简单的网红事件, 而是一个相当值得研究的案例, 这

个案例呈现了底层写作的突围方式以及主流写作如何接纳底层写作的机制, 同时还可观察到这种写作自身存在的悖论和困境。

一、媒体对于范雨素的“底层建构”

迄今为止, 范雨素见诸于媒体的主要作品是《农民大哥》、《我是范雨素》, 而后者是使范雨素一夜爆红的文本。《正午》编辑谈豹谈他读到油印的《皮村文学》, 发现范雨素的作品《有梦想的大哥哥》在其中相当独特, “不符合大多数人对‘打工文学’或‘底层写作’界定的主题、故事和语言”, “其他工友作品大多以‘我’为中心, 写皮村生活经验、工伤与压迫、对村庄童年的美好记忆、对不公的控诉、工业劳动经验和压抑感, 对文学小组和老师的感激之情, 范雨素则写一位跳出读者刻板印象的‘有航天梦的农民’, 她好像一位局外人, 带着冷峻的幽默和理解力, 写人物的可笑可叹, 周围人的关怀与无奈, 描述聪明机警, 有讽刺性, 语言风格强烈, 有很大的距离感和同情心, 不大写苦难、反抗、工业劳动过程和工厂空间细节。”^② 正是这种独特性, 让《正午》编辑选择了范雨素。《正午》如何来呈现范雨素是一件很意思的事。从《农民大哥》到《我是范雨素》, 《正午》在推送范雨素作品时强调其底层身份, “范雨素是湖北人, 来自襄阳市襄州区打伙村, 43岁, 初中毕业, 在北京做保姆”, 强调其精神追求: “她觉得, ‘活着就要做点和吃饭无关的事。满足一下自己的精神欲望’”, ^③ 强调其文笔的

〔作者简介〕 游翠萍,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与艺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四川 成都 610071。

独特性：“她文笔轻盈，有种难以模仿的独特幽默感，有时也有种强烈的力量喷薄而出。她像位人类学家，写下村庄里的、家族里的、北京城郊的、高档社区生活的故事，写下对命运和尊严的想法。今天这篇文章，是她自己的故事。”^④

借助于对范雨素底层身份和精神追求、写作之间存在的反差性的强调和暗示，《我是范雨素》一夜爆红，很多人在阅读时的第一感受是：这怎么会是一个保姆写的？（需要说明的是，范雨素的文学才华其实是不应当被否认的。）然而，编辑正是利用了大众心理对“底层”的刻板印象，甚至可以说是故意地、片面地强调了这种刻板印象。在范文走红之后，在面对很多质疑的情况下，编辑在手记中更多地展开了范雨素的文学阅读背景，承认“她自拟的标题是《有梦想的大哥哥》，张慧瑜老师改成《大哥哥的梦想》，我们发表时改为《农民大哥》，说明这是‘一个农民写的她大哥的故事’。对此我一直有些遗憾——范雨素本人虽然是农业户口，但不是务农为生，以前曾是民办小学教师，如今是从事第三产业的工人，她笔下的大哥也不是个农民形象，而是位空想家，可能出现在马孔多村子的后院，也可能出现在桑丘身旁。”^⑤其实，就阅读而言，范的阅读非常广泛，甚至比很多城市人读得更多，如果她生在英雄不问出处的时代，可能凭借作品就成为作家了，而在这个文学选择机制已经发生变化的今天，她更多需要凭借她的身份来展现她的文学才能。

基本上可以确定，如果没有《正午》对范雨素“底层身份”的强调和对其“文学爱好者身份”的有意淡化，范文的影响力能否达致如此广泛，尚可质疑。这就意味着，底层写作首先必须在阶层（阶级）叙事的场景中才得以发出声音。

二、范雨素的底层反抗与困境

与媒体对范雨素底层身份和社会分层的刻意强调完全相反，范雨素本人却持一种反抗底层身份认定和社会分层的立场。网上有一段范雨素2015年3月29日参加皮村工友之家“皮村，早晚见”讨论会

的发言，从这个语意稍显凌乱的发言中，大致可以梳理出范雨素的立场。首先，对所谓的艺术家、介入等词语，范雨素很不以为然，认为是“挺搞笑的一个词”，“我们不是人吗？人和人就是……握个手交往，怎么叫介入呢？为什么那么高呀，我们都是一个普通人嘛。”她说，如果一个艺术家和一个“肤浅的农民工”聊天，后者会问你有多少钱，如果你说你没有多少钱的话，这个农民工马上就会觉得自己比你更高。在农村的熟人社会里，有钱没钱，农民和农民，农民工和农民工，其实都会分出三六九等。其次，她认为艺术家应当改变这种不平等的思维习惯。“当我们听到农民工和听到艺术家这两个词的时候，听到农民工他感觉他不是一种耻辱或者贬义词，听到一个艺术家他也不觉得这个词哎呀怎么高高在上，它是一个中性词，让它们都变成一个中性词，因为我们……终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是一个平等的关系，高高在上我觉得那种东西就是落后”，“当我们把所有的职业听到我们的脑袋里都是中性词的时候，才是我们这个国家繁荣富强的时候。”^⑥同样，当记者问是否介意别人提“底层阶级”，范雨素明确表示“不舒服”，“不喜欢那种作家，以高高在上的笔法写底层”，也不认同“阶层固化”等提法，“我不觉得阶层怎么固化，大家都是焦虑的。一场大病，一场金融风暴，大家可能都会一贫如洗，只有少数几个人掌握财务。所谓中产看不起农民，我觉得他在自己哄自己”，^⑦“所谓的高层，底层都是同一个灵魂”。^⑧

虽然范雨素并没有以“底层代言人”身份自居，但从她的表达可以看出，在关于底层的自我意识和立场上，范雨素的思考已经远非一般的底层写作者可比。但是，范雨素的立场中也能明显看出矛盾：一方面，她自觉地拒绝他者对底层高高在上的俯视；另一方面，她其实不自觉地又陷入底层的自卑和痛苦之中。比如，她强调自己是一个“弱者”，“我是无能的人，我是如此的穷苦”，赞成像《汤姆叔叔的小屋》、《我有一个梦想》这样的艺术形式对于推动平等、改变身份的积极意义。事实上，这种矛盾和悖论直接呈现在其文本中。

先看范雨素的第一个文本《农民大哥》。从自拟文本名《有梦想的大哥哥》就可以看出,范雨素拒绝农民身份的认定,以有距离、节制、带点幽默的笔触描写了这位“有梦想的大哥”给家庭带来的种种快乐和不快乐。不过,范雨素所拒绝的,恰好是媒体想强调的,特别在媒体将其更名为《农民大哥》,并声称这是“一个农民写的她大哥的故事”之后,对这一文本的阅读就打上了很深的“底层烙印”:大哥不断追逐梦想又不断失败的过程,自然地使读者视为乡土社会不断衰败的历史。实际上,范雨素的反抗本身是有局限的。在大哥的梦想中,有文学家,有发明家,有万元户,在所有梦想破灭之后,大哥不得已只好当农民。农民的层级是最低的。

《我是范雨素》是范雨素一夜爆红的文本,但与第一个文本相比,有一些变化。首先是内容上的变化,《农民大哥》只重点写了大哥哥的故事,而《我是范雨素》写了两个家庭、三代人的故事,展开的社会空间大得多,关注的问题也多得多,可以看到这三十多年中国的变化。这也是此文引发强烈关注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农民大哥》一文的叙事前后一致,而《我是范雨素》一文的叙事出现了明显的前后不平衡。文章的前面大部分,基本上维持着《农民大哥》的节制、幽默风格,但后面部分的叙述,她的情感越过了此前理性的笔触,虽然不是表现为强烈的反抗,但也表现为一种隐忍的抗议和控诉。比如,叙事者将半夜照顾雇主的小婴儿与对女儿的思念并置,“小婴儿睡觉不踏实,经常半夜三更醒来。我跟着起来给孩子喂奶粉,哄她入睡。这时,我就想起我在皮村的两个女儿。晚上,没有妈妈陪着睡觉,她俩会做噩梦吗?会哭?想着想着,潸然泪下。还好是半夜三更,没人看见。”虽然这完全可能是一种真实的情景,但却具有非常强烈的阶级意味。很自然地,她也不可避免地选择了“俯视”的视角,来观看一些命运更悲惨的人:“我的大女儿交的两个朋友,都是这样(无妈)的孩子。他们的命运基本上也是最惨的”,“大女儿……今年20岁,已成了年薪九万的白领。相比较,

同龄的丁建平、李京妮,因为没有亲人为他们求告老天爷,他们都变成了世界工厂的螺丝钉,流水线上的兵马俑,过着提线木偶一样的生活。”在这样的一种叙述中,范雨素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像她所反对的“高高在上者”那样观看不如“白领”女儿成功的孩子,并以“世界工厂的螺丝钉,流水线上的兵马俑,过着提线木偶一样的生活”来定义这些底层人的生活,抽空了这些底层人有血有肉的生命。范雨素本来意欲采取“平视”来解构阶层歧视,将职业转化为“中性词”,却不料中途坠落,同样掉入三六九等的叙述陷阱之中。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这也证明底层写作突围的艰难性。

在范雨素的底层写作中,还存在一个困境——语言问题。正如研究者所观察到的那样,由于从小大量的文学阅读,范雨素的文本语言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阅读者语言”,简洁并不透明,甚至意在言外,是所谓的知识群体和中产阶级非常熟谙的语言。这样一种语言表达形式,与媒体故意强调的底层身份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也是范文得以迅速传播的一个原因。但范雨素这里有一个危险,即明显表现出对于大词、宏大叙事的偏好,如关于皮村那一段,虽不乏幽默,却少了真诚。可能范雨素自己都未曾意识到,在她的写作中有一种“底层语言自卑”,她的写作牢牢控制着底层语言的出场,底层基本上处于失语的状态。如果底层的语言根本不能出场,借助于一套知识群体和中产阶级所熟悉的语言来解构阶层(阶级)叙事,到底可以走多远呢?

以上对“范雨素网红事件”的分析,并非否定了范雨素写作的意义,相反,更是强调了范雨素写作的意义。实际上,范雨素的文学才能是完全可以得到肯定的,其未来更自觉的写作,也有可能突破这一底层写作的困境。但是,从媒体传播和范雨素文本可以看出:其一,当下底层的出场,是需要阶层叙事的场景中才得以出场的。其二,底层的的确确存在着对主流阶层(阶级)叙事的反抗和不满,不过,当底层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时,却往往不期然、有意或无意地应和了主流的阶层叙事模式。

【参考文献】

- ① 洪治纲. 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 [J]. 文艺争鸣, 2007, (10).
- ② ⑧ 淡豹. 关于范雨素的手记. 正午·界面 [N]. 2017-4-25.
- ③ 农民大哥·编者按语. 正午·短章 [N]. 2016-5-20.
- ④ ⑤ 我是范雨素·编者按. 正午·故事 [N]. 2017-4-25.
- ⑥ 腾讯视频<https://v.qq.com/x/cover/y4gpxo9ppj9re4e/a03978kijym.html> [EB/OL].
- ⑦ 范雨素: 不相信文字能改变生活, 我习惯了靠苦力谋生 [N]. 北京时间·暴风眼, 2017-4-26.

(责任编辑 苏 宁)

范雨素现象背后之当今文艺批评观照

颜复萍

2017年4月,一篇花五六个小时完成的7000字左右自传文《我是范雨素》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不到24小时引来了10万+的点击量,并很快超过400万人次。一部作品传播的速度、范围如何,直接反映出该作品的知名度和社会反响。这当然离不开网络自身鲜明的特点,其巨大信息负载量,交流能力和无与伦比的传播功能,使文学作品和批评传播更加迅速与便捷。传媒迅速扩大了从这篇文章延伸到打工文学的各类评论,尤其集中在对其文学审美性与价值思想性的论争上。不知是不屑,还是被边缘化,鲜见专业文艺批评的发声,把沉积多年的传媒批评和专业文艺批评之尴尬,又推到令人不能回避的观照之中。

范雨素这篇文章当然是难得而宝贵的,文字有她的个性,不讨巧不浮夸,平静温和,举重若轻。沉重的现实与坚强的内心,身份的卑微与轻灵的文笔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字里行间迸发出撼动人心的力量。苦难通过文字在与现实命运强势和弱势的强烈对比中,引发了后续波涛汹涌的跨越社会群体的共鸣。不是对苦难生活的怜悯,不是义愤填膺针砭时弊,而是一种平静描述时代巨变激荡与个体命运的坚忍而豁

达的生活态度,令人动容和起敬。比如“我做了别人家的保姆,我的孩子成了有妈的孤儿”;胡润排行榜富人雇主的儿子与范雨素大女儿和两个“物以类聚”的朋友连基本的义务教育也没赶上;北京富人的特权安逸与家乡亲人血泪上访的困苦等等,都在对比中淡然道来。这种朴素自然的“现实主义”书写方式,不能单单仅用“审苦”来解释范雨素的走红,诗中还有“审美”,比苦难更让人心动的,是看见渴望在物质之外寻求生命价值的精神追求的灵魂,这实际戳中了今天大众执着于物质而逐渐麻木的心灵痛点,让人感受到久违的酸楚。不仅仅范雨素,这已是一个特殊现实群体文学创作的文学现象,值得批评家发声。

包括近年包括李娟、余秀华、范雨素等打工文学作品,不乏上乘之作,每每令人惊讶,让人感到了来自民间蓬勃的文学力量。这种文学更接地气,更大程度地走向平民、走向个人生活。打工文学作者对个体在社会中的艰辛与无奈,有着最真切直接的感受,他们表达时代背景中小人物的心灵悸动,这是独有的,远非那种作家体验生活能理解和创作的。“范雨素们”给文学界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重新引发了大众对

〔作者简介〕 颜复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与艺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71。